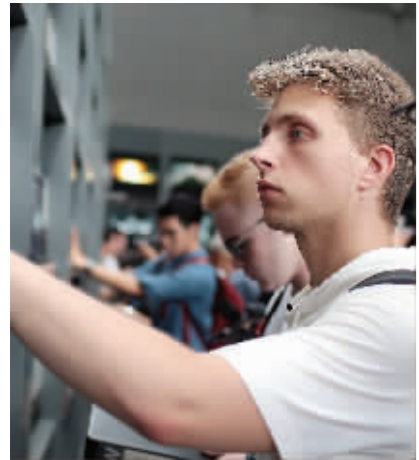


中国有一句古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次,在央视《汉语桥·我与中国第一次亲密接触》的节目中,我们8个人来到南京,以现代快报实习记者的身份,一起寻访1937年12月,中国那段特定的历史,有幸接触到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原始的档案资料,有幸去历史发生地感受当时的场景。在1937年,那些由于各种原因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成了我们这次共同寻访的主题。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走近他们,走近那段历史,并且用所学的汉语,努力完成了独立的表达。谢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

8位现代快报实习记者结束4天 对南京大屠杀国际救援史实的寻访,百感交集的他们,交出了自己的报道——

# 我们记住了拉贝先生的话:可以宽恕,但不可忘却



严立行在查阅史料

1937年12月的一天,南京鼓楼医院手术室,一个受伤的孕妇正在做手术,情况危急;南京某条道路旁边,到处都是尸体;南京一处池塘的水面上,漂着一个失去生命的孩子……

这是一部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像中的3个镜头。它的拍摄者是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当年他用贝尔16mm家用摄像机完成这项工作,总片长约105分钟。这也是目前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是全世界最早、最多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影像证据。

我在波兰的时候学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但是来到南京自己看史料,自己听大屠杀幸存者的讲述,感觉跟在波兰听课完全不一样。

我寻找马吉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找到了他当时工作的教堂。透过这些房子的窗户,可以看到几十米以外明代的城墙。我又走到了城墙旁边的纪念碑前,碑上记载,这附近掩埋了几千名遇难中国人的尸骨。

马吉从窗户里拍到了这些。我不敢想象,如果马吉被日军发现,他可能就会没命,人类历史上就永远没有那105分钟了。

我们波兰也有过跟南京大屠杀相似的暴行,大部分是二战时发生的——卡廷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第一次看马吉拍摄的纪录片,感觉跟看二战炮轰波兰的华沙一样。我们应该得到礼物。12月25日早上,难民营举行了简单的祈祷仪式。让她感到最欣慰的是,她还从日本兵手中救了一个女孩。

历史不能忘记,78年后,我们寻访魏特琳国际救援的故事,我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拉贝故居,找到了魏特琳留下的书信和日记,还有她用生命来守护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老照片。拿着这些老照片,走进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看到当年的100、200、300号楼依然完好。老照片上的场景和现在的能够一一对应上,只是现代化了。在郁郁葱葱的校园里,一片浓荫下,魏特琳铜像静静矗立,她微笑着面向如今校园的师生,铜像下刻着“金陵永生”,和美国魏特琳坟墓上的字一样。

这105分钟在人类历史上就如大海中的一滴水。这滴水折射出不堪回首的过往,同样折射出了可贵的人性光辉。



于中美探访南京师范大学,寻找老照片中的场景

## 1937年魏特琳的圣诞节

现代快报实习记者 于中美 来自美国

“七月底的夜晚,我听到了‘哒哒哒、哒哒哒’嘈杂的士兵声音。”她知道这是军队,有人、马的脚步声,还有枪撞击地面的声音……明妮·魏特琳在日记里,这么写1937年7月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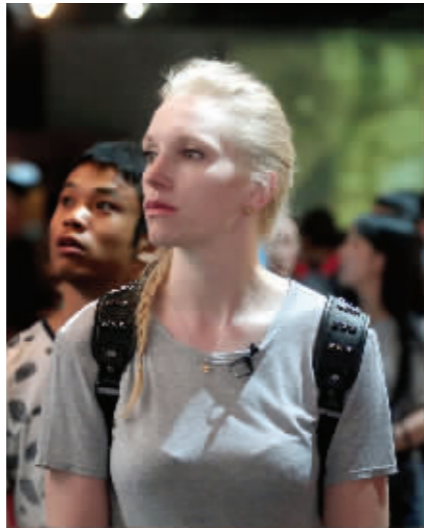
魏特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资深教授兼教务主管,在南京大屠杀开始的时候,学校已经临时西迁到成都,为了维护学校的财产,她自愿选择留在南京。

日军进入南京后,魏特琳作为金陵女子学院的代理校长,只需用美国的身份保护校产,但是她却把校园改作难民营,为一万多名饱受惊吓的妇女和儿童提供住所、食物,给他们以安全保护。然而,日军经常翻墙进校偷粮食,抓难民。她勇敢地站出来阻止难民被侵犯。这期间,她感到心力交瘁。

但是圣诞节还是给魏特琳带来了短暂的温暖和快乐。1937年12月24日,身在南京的魏特琳找了一间相对干净的房间,把房间进行了一番布置,还举办了小小的晚会,尽管物资匮乏,她还是给孩子们准备了小礼物。因为她觉得这一天孩子们应该得到礼物。12月25日早上,难民营举行了简单的祈祷仪式。让她感到最欣慰的是,她还从日本兵手中救了一个女孩。

历史不能忘记,78年后,我们寻访魏特琳国际救援的故事,我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拉贝故居,找到了魏特琳留下的书信和日记,还有她用生命来守护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老照片。拿着这些老照片,走进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看到当年的100、200、300号楼依然完好。老照片上的场景和现在的能够一一对应上,只是现代化了。在郁郁葱葱的校园里,一片浓荫下,魏特琳铜像静静矗立,她微笑着面向如今校园的师生,铜像下刻着“金陵永生”,和美国魏特琳坟墓上的字一样。

战争是悲惨的字眼,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它,历史当中的战争是必须要记住的,但我想强调的是,记住历史不是为了恨,而是为了吸取教训,避免再次发生悲剧,只有承认过去才能往前走。



了解了很多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卡美拉心情沉重

## 不分国籍的爱

现代快报实习记者 卡美拉来自挪威

在来到南京之前,我有期待,但我也有些紧张。有这些感觉,主要是因为有个中国朋友曾给我讲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在这里,我会听到些什么故事,我会看到些什么,而这时又会如何影响到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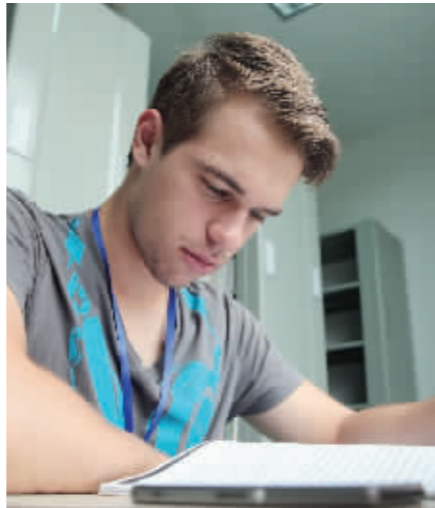
7月17日,当我去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苏国宝老人家时,我了解到老人家今年已88岁,但精神很好,记忆也很清楚。7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他说起来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一样。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有10名亲人遇害,他3岁的弟弟苏国久被日军扔到河里淹死……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想起了自己在挪威的弟弟,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果要亲眼看到他离去,我会怎么生活下去。

在南京市档案馆,我看到了德国人京特博士在1944年、1946年时写的日记,还有当时江南水泥厂的很多信函、文件,得知京特在日军占领南京期间,一直在江南水泥厂,并帮助了很多难民。由于京特是德国人,战后京特本来要被遣返回国,但江南水泥厂的负责人给当时的南京市政府市长写信,请求不要将京特遣返。还有辛德贝格,他和京特一起来到江南水泥厂。在紧张残酷的战争时期,辛德贝格、京特博士等人不顾自身危险,不但救助难民,还拍下了当时的照片,让大家知道了当时的南京发生了什么。

战争是残酷的,但我也能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就像辛德贝格和京特这两名国际友人对难民的帮助,这并不是他们本职工作要求,完全是因为看到别人需要救助时去做的。战争来临,他们完全可以返回自己的祖国安心生活,但辛德贝格和京特两个人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更加努力地尽可能地帮助难民。

战争是悲惨的字眼,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它,历史当中的战争是必须要记住的,但我想强调的是,记住历史不是为了恨,而是为了吸取教训,避免再次发生悲剧,只有承认过去才能往前走。

在南京4天,马上就要离开,最后我希望以拉贝先生的一句话,作为这趟旅程的感悟和结语——对于战争和一切暴行,我们可以宽恕,但不可忘却”。



安东雷在阅读有关史料

## 南京的「活菩萨」——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现代快报实习记者 安东雷来自德国

在南京以前,南京大屠杀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概念。除了大概的日期和日军侵华的事实以外,我对那时发生了什么,完全不熟悉。因此来到南京后,我特意查阅了很多资料,并走访了大屠杀幸存者,听到他们的故事,听到他们经历过的绝望和暴力,很快就会发现,那些事一辈子都忘不了。

但尽管如此,他们并不充满仇恨,“我不恨日本人民,我恨的是战争和它的后果。”一位92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说。

这样的说法,和很多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想法很像。与此同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场暴行中,许多国际人士站了出来,冒死保护了数以万计的难民。德国人拉贝,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曾有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留在南京,他回答:“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国家,例如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他的孩子都在这里长大,而中国人始终对他和他的家人都非常好,那么,他就应该理解,我为什么要留下。”

作为安全区的主席,拉贝的主要工作包括管理安全区的住宿、饮食、医疗、卫生与安全问题,此外,他还要和中方、日方,以及各国的外交官沟通、谈判。他位于广州路的住宅,作为难民收容所之一,保护了600多名难民。

对于住在他院子里的难民,即使粮食紧张,他也至少保证每人每天能吃到一顿稀饭。所以,只要拉贝一出门,大家都跪在地上,叫他“活菩萨”。但对拉贝来说,这些跪拜他的中国人,让他“难觉得不知如何是好”。在安全区里,拉贝和其他国际人士共救援了约25万难民。

我想,拉贝先生最初选择留下来时,并不知道自己已成为这么多人眼中的“活菩萨”,但这位普通的德国人,依旧以其内心的勇敢和坚毅,秉持良知,点亮了黑夜。

在南京4天,马上就要离开,最后我希望以拉贝先生的一句话,作为这趟旅程的感悟和结语——对于战争和一切暴行,我们可以宽恕,但不可忘却”。



爱文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纪录片

## 南京夜空永恒闪耀的星辰

现代快报实习记者 爱文来自俄罗斯

“你看到的一切,从尘土中来,还是要回到尘土中去。”生命本身就是价值,我们无需争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写那些证明了没有任何财富比生命更可贵的的人。

今天我们知道,1937年有一群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决定牺牲自己的财富去拯救成千上万他们没有见过的人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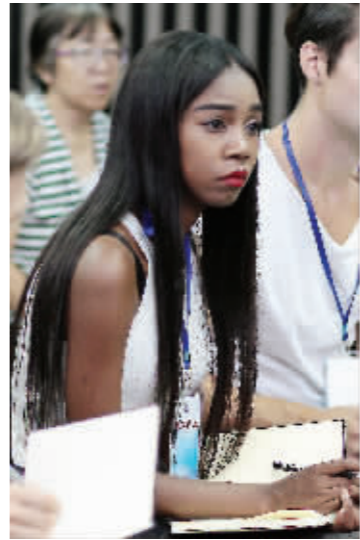
刘易斯·史迈士,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将日军暴行每日写成抗议书,送往日本、美国、德国、美国大使馆等地。他这样形容战争巨大的破坏作用:“可怕的战争会将我们带回到洞穴时代或更早。”他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能离开自己的学生和南京人民。这是他一直不回国而坚持留在南京的理由。

在危难之中,有一些人足够坚强,能够分担另外一个国家的痛苦。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于1937年11月22日在南京打响首战,首位在空中牺牲的烈士是24岁的苏联空军中尉涅日丹诺夫·尼古拉·尼基福罗维奇。这位烈士的家乡离我的家乡很近,他牺牲时才24岁,跟我差不多,太可惜了。因为他表现英勇,后来被授予“红旗勋章”。

上百名苏联飞行员没能回到他们的祖国,而是永远留在了南京。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们所知甚少,但我们给他们的荣誉,却不能因此减少。

一位先知曾说过:“你看到的一切,从尘土中来,还是要回到尘土中去。”

这篇文章要献给的人们和他们的事迹,永远不能被忘记。这些人永远不会变为尘土,因为他们已经变为在南京夜空永恒闪耀的星辰。



梅丽莎听幸存者讲述亲身经历

## 他们选择留下,在这里救死扶伤

现代快报实习记者 梅丽莎来自南非

在南京的鼓楼医院有三座老楼,最老的一座已经125岁了。1937年12月,南京被日军侵占后,鼓楼医院也因此成为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城内唯一对平民开放的医院,威尔逊医生、鲍恩典女士以及其他同事一直留在这里。78年前,这里每天都上演着救死扶伤的故事。其实,在1937年12月以后,在这个医院发生的一切,只有很少的资料留存,这两名医生的日记成为第一手史料。

我一边读着日记一边在想,威尔逊医生为什么不回国,他的国家那时候没有战争,回国后自己的安全可以得到保证。但我从后面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我们接到大使馆的最后警告,明天上午9点半,留下的美国人要离开,只有很少的资料留存,这两名医生的日记成为第一手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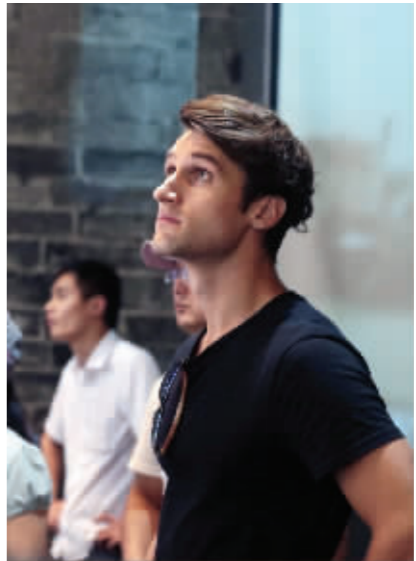
在危难之中,有一些人足够坚强,能够分担另外一个国家的痛苦。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于1937年11月22日在南京打响首战,首位在空中牺牲的烈士是24岁的苏联空军中尉涅日丹诺夫·尼古拉·尼基福罗维奇。这位烈士的家乡离我的家乡很近,他牺牲时才24岁,跟我差不多,太可惜了。因为他表现英勇,后来被授予“红旗勋章”。

在危难之中,有一些人足够坚强,能够分担另外一个国家的痛苦。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于1937年11月22日在南京打响首战,首位在空中牺牲的烈士是24岁的苏联空军中尉涅日丹诺夫·尼古拉·尼基福罗维奇。这位烈士的家乡离我的家乡很近,他牺牲时才24岁,跟我差不多,太可惜了。因为他表现英勇,后来被授予“红旗勋章”。

我越读到后面,越有一种读不下去,想合上日记的冲动。这场战争的残酷远超乎我的想象。他的每一篇日记我觉得都是最后一封。他不仅仅是一名好医生,更是一个“好人”。

而鲍恩典女士,看到日记的内容后,我感觉到她变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多的受伤平民涌入医院,因为没有床位了,我只能让他们睡在药房的地上……”

如今,威尔逊医生的日记保存在美国耶鲁大学,鲍恩典的日记保存在南京鼓楼医院。它们遥相呼应,穿越时空,这不是他们个人的心情,而是当时南京人共同的心情,只不过他们用日记的形式把这种转瞬即逝的见闻和感受记录下来,成为历史的一种见证。



罗斯文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

现代快报实习记者 罗斯文来自新西兰

2015年7月17日,天空下着雨,行走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草木清新的味道沁人心脾,但是78年前的冬天,这里曾住着近万名饥饿、恐慌的难民,四周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70多年的岁月流逝,这里的建筑似乎还是当初的模样,它们矗立在这里,似乎在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

1937年7月,身在日本的美籍传教士贝德士,听闻日军侵华战争爆发,于是克服重重困难又回到南京。其实,在面临灾难时他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最终,他还是做了最危险的选择。

在南京,贝德士与拉贝等西方人士呼吁建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用他们的外籍身份避免日军虐待安全区里的外国人和中国难民。1946年7月29日,贝德士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以无可辩驳的确凿事实论证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这几天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战争发生后,是什么让贝德士留了下来。直到在拉贝故居,看到贝德士那句著名的“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

我想,他一定是对中国最底层的人也怀有极大的怜悯。当日军用枪指着他的时候,他肯定也意识到自己留在这里很危险,可能也做好了在南京面临死亡的心理准备。

有一句话叫做,邪恶之所以横行,是因为好人无所作为。在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有很多人需要帮助的人。我想,是他对人类强烈的信仰和正义感,让他留了下来。对于他而言,生命的意义就是保护和帮助他人。这是很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林宜龙参观约翰·马吉住所旧址,和老照片对比

## 他是我心中的传奇

现代快报实习记者 林宜龙来自印度尼西亚

“我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严重危险。淫欲、疯狂并且喝醉了的士兵强奸妇女以后走出屋外,谁也不能确定自己命运如何……”但是,他选择了留下。在一辆挤满军人的列车里,他把拍有日军暴行的胶片藏在大衣里,冒险带到上海,并向世人传播。

这个人就是乔治·费奇,中文名费吴生。因为这次冒险携带胶片,他在我心里,成了一个传奇的人物。南京大屠杀发生时,费奇担任安全区的总干事,负责安全区的实际事务,和拉贝一起做了很多事。不过在我前往江东门纪念馆、鼓楼医院、拉贝故居寻访时,并没发现很多费奇留下的东西,只找到了3张照片,其中两张合影:一张是他和马吉去鼓楼医院拍摄时与医护人员及伤员在一起的照片,另一张是安全区委员会成员的合影照片。不知道是费奇比较低调还是不喜欢拍照,直到我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了特意为我取出的他的日记,才好像真正找到了这个人。

在费奇的日记里,我看到了1937年12月12日沦陷前夜南京的历史景象。城门紧闭,士兵爬上城墙想逃出城外,超载的人群让船只倾覆沉没。他也见证了中国人民在最后一刻的抗争。费奇在南京曾经度过愉快、平静、有秩序的时光就此结束。

后来,费奇有机会乘坐日本军列,他在日记里写到,“我和一群不知耻的士兵挤在一起,感到一点紧张。因为8卷关于日军暴行的16毫米电影胶片缝在我的驼毛大衣里,其中大部分是在金大医院里拍摄的。毫无疑问,当我们进入上海时,我的包会被仔细检查。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些胶片会发生什么事。”庆幸的是,秘密没有被发现。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记录了历史的影像。

费奇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为了救人牺牲了自己的生活,牺牲了和家人团聚的时光,每天面临着危险。他是我心中的传奇。